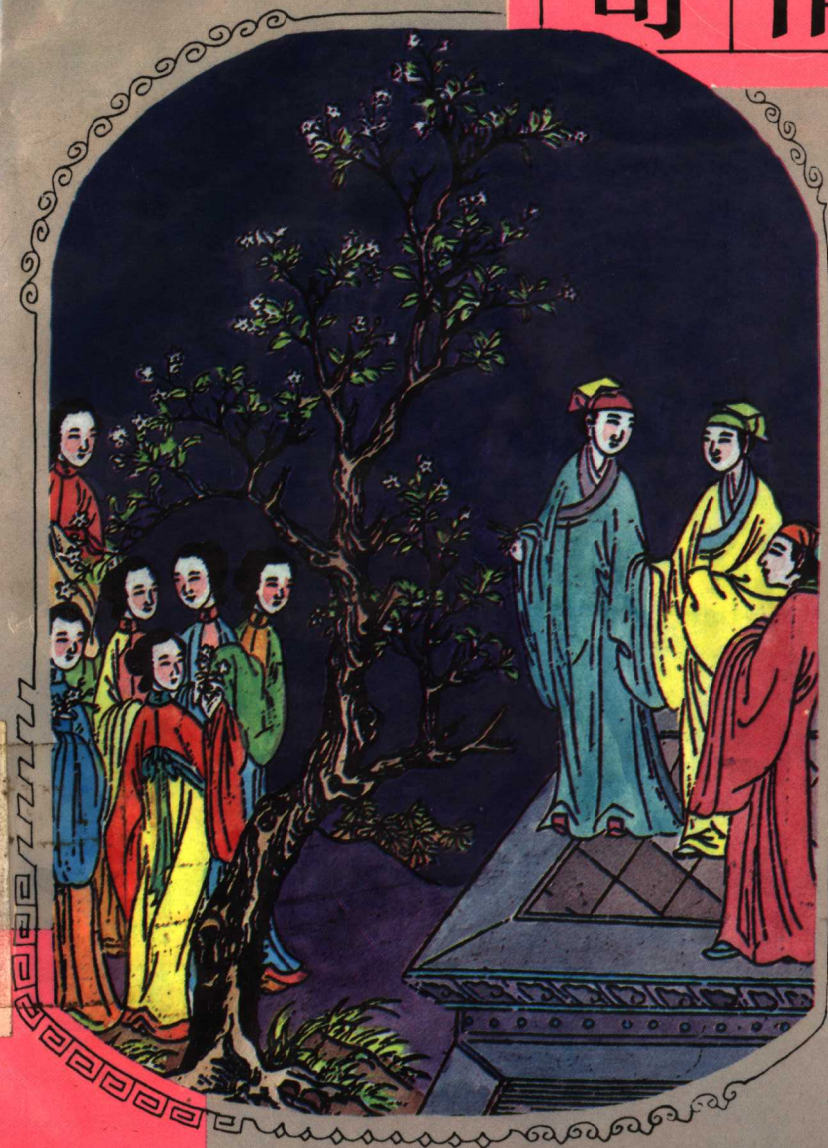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

李春青 李珺平 主编  
郭英德 过常宝 著

# 明 奇 人 情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之七

# 明人奇情

郭英德 过常宝 著

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编委会

顾问 童庆炳 林剑鸣  
主编 李春青 李珺平  
编委 郭英德 谢思炜 张海鸥

(京)新登字 160 号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之七

明人奇情

(全套丛书共八册)

郭英德 过常宝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字数：132千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版

印数：1—3 000

---

ISBN7-303-03275-4/I·3

定价：4.50元

## 总 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术制作、言谈行止中往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往蕴含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 and 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氏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明了，人的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高兴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表、风度？甚至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标识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

“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理之上的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中、清谈品茗中、诗文酬唱中、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张扬我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多姿，研究继承先人文化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以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然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以“雅风美俗”为核心，在具体描述阐释上将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民风民俗。在婚丧嫁娶中、节日庆典中、服饰装潢中、生活习惯中蕴涵着一个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处处显露着对美的向往，对丑的弃掷。例如，唐五代时何以兴起女子缠足之风？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第二，文人习气。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审美倾向以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文人的行为方式、时代风尚、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趋美避丑之风。例如，魏晋士大夫何以喜着宽袍大袖，甚至带兵的儒将也“羽扇纶巾”？不少名士敷粉施朱，效女子之态，这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审美趣味？

第三，典章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形式构成一系列典章制度、仪礼规范，它们对时代的“雅风美俗”有极大影响。例如，“汉官威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造成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对时代的审美精神有何作用？九品中正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气？都大有可言说者。

第四，艺文之作。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器物、书法、戏剧、诗文都是时代审美趣味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一定“雅风美俗”的升华，又反过来巩固、强化着一种美的文化和风俗。例如，元明戏曲对百姓的审美倾向就有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亦复

如此。

第五，经子之学。历代均有阐发玄理、探求奥义之人，都有追问世界本原、人生真谛之人，诸如儒道之说、佛释之学或论非常之道、或析人伦义理，诸子百家，各显其时，它们都对一个时代的雅风美俗同样有大影响。例如，儒家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中是怎样变为美丑标准的？道家思想与寄情山水、饮酒狎妓的文人习气有何关联？这均为本《丛书》所要阐发的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是丛书可能涉及的大致范围。但因每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有远近之别，材料有多寡之分，它们必然依据各自的情形而有所侧重，能恪守“雅风美俗”之主旨即可，并不强求一律。

**丛书编委会**

# 目 录

● 引 言	(1)
一 从禁锢到超越	
1. 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	(2)
2. 王守仁心学的崛起	(5)
3. 心学的世俗化	(9)
二 奇的内涵	
1. 死水微澜	(13)
2. 奇行异举	(15)
3. 奇谈怪论	(22)
4. 奇思异想	(29)
5. 新奇——明人审美精神之一	(33)
三 情的奥秘	
1. 从良知到性灵	(39)
2. 情爱：情的理想化	(43)
3. 情欲：情的世俗化	(49)
4. 情痴：情的普泛化	(52)
5. 情趣：情的艺术化	(55)
6. 真情——明人审美精神之二	(59)
四 性灵艺术举要	
1. 师心与师古之争	(69)
2. 性灵诗的审美趣味	(76)
3. 山水风俗小品撷英	(81)
4. 奇闻异事散文咀华	(87)

5. 文人画的意味..... (92)

## 五 戏曲艺术发微

1. 传奇，传奇也..... (99)  
2. 十分情十分说出 ..... (106)  
3. 十部传奇九相思 ..... (114)  
4. 戏曲艺术的审美精神 ..... (120)

## 六 世俗的艺术

1. 泼天富贵 ..... (126)  
2. 情色相当的婚恋 ..... (131)  
3. 享乐与纵欲 ..... (137)  
4. 家常日用之奇 ..... (143)  
5. 悟空与八戒 ..... (148)

## 七 波颓风靡

1. 明前期的淳朴风俗 ..... (157)  
2. 竞相夸耀的华服 ..... (160)  
3. 奢侈豪华的宴饮和建筑 ..... (162)  
4. 繁文缛节的礼仪 ..... (163)  
5. 人心谲诈，伦理崩溃 ..... (164)



## ● 引 言

明代社会以正德年间（1506—1520）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沿袭宋元文化，封建专制达到烂熟的地步，思想文化界“非朱氏之言不尊”，文学艺术也萎靡不振。后期由于专制制度本身的腐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茁生，思想文化界极为活跃，也极为混乱，文学艺术也蓬勃兴盛，百花齐放。

本书以明代后期的雅风美俗为主要描写对象，同时发掘其与明代前期文化的渊源关系。（1）明后期社会文化特征，首先孕育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大批“狂简”、“狂狷”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不守规范，不受羁锁，率性自为，任情自适，表现出前所未见的人格特征。（2）明后期社会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市民性、世俗性，在社会风俗、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文学艺术各个层面都是如此，市民的情趣，世俗的格调，波染甚至替代了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雅正情趣，煽起了如火如荼的世俗享乐之风。（3）率性自为的人格理想和世俗享乐的精神倾向，升华为一种慕奇好异、独抒性灵的审美精神。心学特长的内省倾向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重一己而轻外物，重冥会而轻实证，更多地追求超脱外物的束缚，满足个人的生活情趣或主观的精神境界。这就构成了明人崇尚新奇、标树真情的审美精神。

# 一 从禁锢到超越

## 1. 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

经过元末数十年的社会大动乱，公元1368年，由草莽起家的朱元璋终于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

不知是不是朱元璋也姓朱的缘故，他对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景仰备至，连带及之，对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不免心向往之。

朱熹的学术在南宋一直被视为“伪学”，备遭凌辱。到了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学才总算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但是直到元明之际，朱学仍未真正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也没能成为官方唯一的统治思想。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记载，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虽然拥有帝王之尊，却并无一定的经典可读，闲时只能杂览《说苑》、《韵府》、《道德经》、《心经》等三教九流的书藉。解缙对此状况极为不满，于是递上万言书，建议修书，“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

所谓“关、闽、濂、洛”，指的是宋代理学的正宗程朱理学。解缙的意思，就是想用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

朱元璋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尽管他还无暇大规模地修书，但却明确不二地倾向于程朱理学。他和刘基沿袭元朝皇庆条制，制定了科举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钦定朱

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派的其它解经著作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并且明确规定：“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清阙名《松下杂钞》卷下）

甚而，朱元璋对笃信理学、鼓吹道德的文学作家和文学作品也青目独加。

元末戏曲家高明撰《琵琶记》戏文，极力地提倡道德风尚，塑造了“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朱元璋对此极为欣赏，曾郑重其事地对臣下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明徐渭《南词叙录》）

到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朱棣秉承父志，便下诏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次年，书成进览，朱棣亲自作序，随后命礼部刊赐天下，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废皇庆条制所定注疏不用。

为什么朱棣风风火火地纂修颁行三部《大全》呢？

原来，他的目的是让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秘”，从而“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见朱棣御制序和胡广等人进书表）

一句话，朱棣是想用三部《大全》来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借以消弭他以不正当的手段篡夺皇位所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其用心可谓良苦！

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其意义决不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以后，从中央国子学到地方的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都用朱熹的学说进行教育。社会上，家庭里，朱学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制约着人们的言论行为，涂染着文化的方方面面，妆点

着新朝门面，粉饰着“太平盛世”。

从此以后，朱学有如万里长城，以其坚固的城墙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述朱”状态。明人何乔远《儒林记》上《名山藏》写道：“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因此，“有质行之士，而无异同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专门之学。”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圣贤之学”，舍朱子之学无以进而立学者之林。（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七《习庵说》）

从此以后，程朱理学成为文化领域的无上权威。巍峨耸立的节孝牌坊，金碧辉煌的义门旌表，伦理教化的高文典章，“代圣贤立言”的诗赋八股，到处标帜着理学原则对人类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独断统治。

于是，人们对传统思想亦步亦趋，奉行不悖，不敢持丝毫的怀疑之见。对《六经》注疏不敢提出质疑，对圣人之道只能述而不作。人们不必要独立思考，也不可能独立思考，只要老老实实地“一尊朱氏为功令”就万事大吉了。

有位著名学者章懋，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可是有人劝他著书时，他却严肃地回答道：“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可也。”（《明史》卷一七九本传）

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严格地禁锢了文人的思想，腐蚀了文人的心灵，使他们除了坚定不移地和程朱理学保持步调一致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思想、个人的精神。

于是，人们对异端之学视如寇讎，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号称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就曾作《诸子辩》一文，批评诸子学说“汲汲功利”，其弊“惨于刀剑，虐于烈火”。在他们看来，学术思想只能有程朱理学一家，其余都是邪门歪道，是“野狐禅”，“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清朱彝尊《道传录序》）

在程朱理学的指导下，明初文人把“三纲五常”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宋濂认为“三纲”是天地之间的“大经”，决不可废。（《宋学士全集》卷二《贞节堂记》）薛瑄认为“三纲五常”是天地间“至大”的东西，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以此为“本体”。（《读书录》卷六）

当然，明初文人不仅只是在嘴皮子上说说而已，他们还往往身体力行地实践“三纲五常”，谨守理学家的做人规范，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种风范，和明中后期一大批口谈仁义、行同狗彘的假道学是迥然不同的。

方孝孺就是这类理学家的人格典范。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兵攻入金川门，建文帝在宫中举火自焚，侍讲学士方孝孺被执。

朱棣欲文饰其篡夺丑行，令孝孺草诏，以塞天下人心。孝孺忠愤不屈，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命杀孝孺，并夷其十族，坐死者凡 847 人。

临刑，方孝孺仰天长啸，口占一诗，云：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谗。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我不尤。

方孝孺以“十族之诛”维护了天下万世的纲常名教，他的慷慨就死，体现了理学原则和忠贞气节的完美统一，因此他成为“千载一人”，“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赞》）

## 2. 王守仁心学的崛起

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的确培养了一大批刚强不屈、正色立

朝的忠臣义士，并蔚然形成有明一代的风气。自方孝孺以后，明朝士人多讲气节操守，亡身为国之辈，代不乏人。海瑞之谏世宗，杨继盛之劾严嵩，杨涟之劾魏忠贤，东林诸贤之舍生忘死，就是其皎皎大者。影响所及，至于草野。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条记载：

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藉，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练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拔，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

但与此同时，程朱理学的束缚，八股取士的桎梏，也造成了思想文化界普遍的僵化和保守。明人杨慎形容当时思想文化的迂腐卑弱称：“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文字之衰》）清人朱彝尊评论当时的文学状况是：“成、宏间诗道旁落，离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静志居诗话》）

“物极必反”。朱学的流弊，怎能不成为人们转求心学、另辟途径的契机呢？

而英宗正统朝以后，宦官专政，吏治黑暗，内乱外患频仍，用王守仁的话说，这种“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痼”的局面，“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储柴墟》）

社会危机更加重了思想文化的危机，整个思想文化界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化。《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写道：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陈献章（1428—1500）早年曾锐意科举，后来屡试不第，促使他由读书穷理转向唯求本心，进而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崖海曲”（明张翊《白沙先生墓表》），从而建立起异于朱学的心学思想体系。

陈献章标立“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和“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均见陈献章《白沙子》）这种为学之道，和朱熹理学异趣，而与陆九渊心学同旨。“朱子求一贯穿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陆九渊则主张“易简工夫”，唯在“先立乎其大者”或“发明本心”。朱主“居敬”，而陆倡“求静”。由此可见，陈献章的学术思想与陆学何其相似乃尔！

陈献章在朱学独尊的情势下向陆学逆转，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明中后期心学的先声。

当然，朱、陆本来相通，于朱学中摸索未得而入陆，于陆门中求解不悟而入朱，宋末以来，不乏其人。这种和会朱、陆异同的社会思潮，也是陈献章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王守仁（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是被人们誉为“绍尧孔之圣传”、“倡周程之道术”的著名理学家。他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明，而学术不明是由于朱学的流弊所造成的。因此，以“正人心，息邪说”、“而后天下可得而治”自任的王守仁，便从攻讦朱学入手，企图另辟蹊径，以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于是，王守仁“范围朱学而进退之”，以陆学的本心论为主，兼取朱学的理欲、理气论，又渗透禅宗思想，加以熔铸，脱胎成为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他在不背离儒家传统和理学精神的前提下，对儒学和理学进行了自我式的发挥，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

《传习录》里记载了他和得意门生徐爱的一段著名对话：

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王守仁答：“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这种理论，既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道无有外于吾心者”的发展，也是禅宗“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再版。

一天，王守仁偕友人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王守仁解释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显然，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论，却很能蒙骗不善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友人说的是“此花”的自开自落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愿望而独立存在；王守仁把“此花”偷换为“此花颜色”，非得借助人的“看”，才能明白起来。本来，与人相关的只是“此花颜色”而非“此花”，这无疑是深有见地的；但是以此引申说明“此花”也与人相关，却纯属诡辩。王守仁用这种虚幻的诡辩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免使王学体系犹如累卵，危乎殆哉。

“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这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他称之为“学问大头脑”。（《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三《年谱》二）此法以“心即理”为根本，颇得益于禅宗。

禅宗经典《传灯录》里，记载了香严智闲禅师“格竹子”的一则故事。说是智闲禅师参见泐山禅师，泐山问他：“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

智闲被问得哑口无言，回去后遍寻平日看过的文字，竟一点也找不到答案。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一气之下，将平日所看文字统统烧毁。

后来，智闲禅师在南阳安居，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



中竹子，从竹子的空空作响中忽然悟得了“空无”的道理。于是焚香遥礼汾山，感激不尽。（《五灯会元》卷九）

王守仁对智闲禅师的悟道深有感触，便依样画葫芦，也做起格竹子的功夫来。结果据他所说，“早晚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值得注意的是，“致良知”说作为道德修养论，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内容归宿的。王守仁把“良知”与“天理”等同起来，以之论证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借以达到“破心中贼”的政治目的。这是他一生奉行不悖的准则。

### 3. 心学的世俗化

王守仁心学的本意，是要把伦理纲常灌输到人们的内心里，使之成为人们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把伦理纲常说成是外在于人们心灵的道德约束，像绳索一样束缚人们。这一观点引发出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一是否认用抽象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二是突出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

这两个理论命题打破了明初“迷古”的屏障，成为催生近代文化思想的媒介。诚如明人焦竑所指出的，王学一出，“闻者震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澹园续集》卷四《国朝理学名公词记》）

明中后期李贽和泰州学派甚嚣尘上的异端思想，正是从王守仁“绍尧孔之圣传”的正统学说中脱颖而出。

泰州学派是王艮（1483—1541）开创的思想学派，在16世纪盛极一时，先后出现了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等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深受王学的影响，但却自成